

为影片音乐“打补丁”的人(上)

——记著名指挥陈传熙

◆ 孙渝烽

但凡喜爱电影的观众，特别是中老年电影爱好者，对于陈传熙这个名字必然十分熟悉，稍注意一下字幕就会发现“指挥陈传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解放后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拍摄了无数人们喜闻乐见的电影，其中很多影片的音乐就是陈传熙指挥完成的。他指挥的配乐影片多达六百多部，在这里我仅举几部：《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山传奇》……美术影片《牧笛》《金色的海螺》《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还不包括他完成的大量科教片、电视剧。

新中国成立后陈传熙出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他指挥演出的交响乐也多达六百多场，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的风格清晰、流畅、严谨、准确，在音乐界享有好名声。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编导演，也离不开“化(妆)服(装)道(具)摄(影)录(音)美(工)”的和谐成功配合，再加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打动人的音乐(作曲)旋律，让人们为之动情，这中间就离不开乐队和指挥的功劳。还有插曲，如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之歌”，《红日》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红色娘子军》中的“向前进”……有多少多少少的电影插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曲，陪伴着几代人成长，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而就是他，陈传熙，用他那熟练的指挥棒，把这些歌曲和音乐带给人们，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

家里的一架风琴陪伴他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敏锐的听力

陈传熙能有这样出色的成绩，和他从

有多少电影插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曲，陪伴着几代人成长，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而就是陈传熙，用他那熟练的指挥棒，把这些歌曲和音乐带给人们，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



■ 陈传熙(右)和著名演员白穆

小喜爱音乐、奋发努力是分不开的。1916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广西南宁人。当时家里有一架风琴，兄弟姐妹都不感兴趣，而他特别喜爱，这架风琴陪伴他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敏锐的听力，辨音的悟性特别高。

1921年，七岁的陈传熙随父亲在越南凉山居住，当时法国驻军有一支管乐队，经常会集体演奏，调剂军中生活。那深厚、雄壮、华丽的乐声不仅把小小的陈传熙带进了一个美妙、广阔的音乐天地，更使他迷上了音乐。每当军乐队走出军营演奏时，他跟在队伍后面，不管多远都跟着听着，嘴里哼着，他记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他能模仿不同的乐器哼出不同的声响，他能哼出乐曲的很多片段，那些旋律扎进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1927年，因为随父亲移居海防市，陈传熙有幸进了一所华侨开办的中学。这个学校十分重视音乐教学，这给他打下了扎实音乐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五线谱，学会了吹小号，成为学校管乐队里最小的演奏员。由于他痴迷音乐，学得十分认真，小号能吹奏出不同的旋律，能掌握不同的声部。优美的音乐素养又形成了他一种十分平和的性格，心态特别好，所以他学习特别踏实，特别有成效。

1958年陈传熙正式调进上影乐团任指挥，一直干到1992年退休

1934年，19岁的陈传熙终于遇到了他

人生中的伯乐。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来到偏僻的西南，在这里招收官费待遇的音乐专门人才。陈传熙以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大门。国立音专当时有20多名学生，酷爱音乐的陈传熙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他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于音专的钢琴系，双簧管又吹奏得特别出色，他的优异成绩使他很快进入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并且还在国立音专教课，后来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加上他的音乐天赋、潜质和对音乐的执着热爱，终于成为中国的音乐人才。解放后，作为新中国的交响乐团他曾多次出国参加演出，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1958年由于电影发展的需要，他正式调进上影乐团任指挥，一直干到1992年退休，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闲下来。

陈传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看到总谱，就能根据影片的长度准确制定出乐曲主旋律的节奏、时值，使乐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影片的配乐任务。很多电影导演和作曲家和他合作都十分愉快，他常常能在配乐过程中给作曲、导演提出一些极为宝贵的建议。这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看到电影画面会产生很多联想，从而充分发挥音乐的感人效应。他能给配唱电影插曲的歌唱演员以充分展示美妙歌喉和动情的乐感，从而帮助演员达到神情并茂的效果。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曾对我说，和陈传熙指挥合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在录音棚里十分耐心，给我们充分酝酿的时间，让我们情绪十分饱满时才录唱歌，即使时间非常紧，他总为演员创造条件，尽力帮助我们完成最佳的录音状态”。任桂珍提起陈传熙总是十分动情。

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二十七、授徒五常

周慧珺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相识三十余年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他的书法老师。张五常满头银发，面色呈红紫色，逼肖印地安人，眸前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瘦高，有仙风道骨之范，难怪有人称其“侧面轮廓颇类徐悲鸿所绘之泰戈尔像”。

五常先生有“五常”——首善经济，其他依次为摄影、散文、书法、收藏。五十五岁那年，张五常痴迷书法，惜之无名师点教，进展颇缓，为此每日苦痛。简庆福闻悉此事，就向张五常推荐了周慧珺。周慧珺的出现使张五常感觉如沐春风，称她“聪明，记忆力强，不说假话，教得用心。她怎样批评我就怎样考虑改进。老师也教用纸、用墨、用水，教前人之见，也教怎样品尝”。周慧珺一年间前后四次飞抵香港为张五常授课，第一次给张五常讲课，首先教的就是执笔，声言执笔要学一年的时间，并让张五常写几个字给她过目。张五常依言执笔写了几个字，用张的话来说“写得一塌糊涂”。但周慧珺看了后，却很满意，高兴地说：“你执笔完全正确，不用学了，你学书法会比其他人起码快一年。”也就是说，周慧珺认为在技术上最困难的执笔张五常基本过关，同年已六十二岁。实则前人对执笔法论述连篇，但说白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写，不要拘泥规绳。所以执笔如何更多地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内在核心强调“舒便”“熟手”，哪种姿势最适宜发挥就是最合理的。

应当说，周慧珺是个相当高明的老师，她不喜欢简单的言语说教，而是喜欢用肢体表现——亲身示范。周慧珺喜欢用纯羊毫，“毛纯颖长，如执润玉”，柔而健的特性极为适合周慧珺发挥她大笔如椽、神定气足的风格特征。一般来说，纯羊毫笔过于软，不太好用，但周慧珺却是越软越好，毛身须要齐整，写出一笔一划线条醇厚，线质表现力强且多变。

刚练书法，张五常就听见一些朋友及专家建议他不用临摹，写自己的字。但周慧珺是

一个极其重视临摹的书法家，熟谙入帖的重要性，坚持要张五常从临摹开始做起。但也考虑到张五常临老学书，可以鲤鱼闯龙门，不临隶书、楷书，以临行书开始，这也算得上是否定了以隶书或楷书作为先习基础的传统看法。周慧珺不在香港时，两人就通宵达旦地打起长途电话，通过电话探讨书法问题，不寐不休。“没有老师在身旁，一笔一笔地教变，自己明知要变但奇怪地变不出来”，张五常如是说，“但若有名师指导，多作思想、研究，只是时日的问题”。

张五常的性格是放浪不羁却又豪气干云，身上的每条血管、每根神经都投射出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气势，这是张五常的天性使然。但不要忽略张五常的猖狂性格中也有着贵谦抱礼的一面，对于有才识的人张五常一贯是抱以礼敬的，对周慧珺他一概称呼“周老师”或“周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对于涉及敏感的金钱问题，张五常十分欣赏周慧珺的心态。近几年，周慧珺的书法仿作非常多，总有人为了金钱利益假冒她的书法，肆意出售。张五常就将事情告诉了周慧珺，谁知周慧珺竟然不怒反喜，让人一头雾水。但仔细想想张五常就感觉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他的书法啊！说明自己的书法离市场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无庸讳言，写书法，有人出钱购买非常重要，但如何写出令买者为之倾倒、为之折服的作品才是重中之重。周慧珺曾对张五常讲：“三十年前有人出钱求字，只几块钱，但就是这么一点钱，这么一小幅的作品已经让她写得睡不着觉了。”

张五常评价周慧珺：“用笔的功力，当世无出其右。至于她的书法是否可以直追古人，却是见仁见智的判断了。个人认为，周老师的书法，美中不足之处有二。其一是她写得熟练了(四十多年的功夫啊)，而又对自己那样苛求，因而缺少了一点‘错有错着’的惊喜。其二是她不肯‘乱’写一通。本来周老师——像我一样——是很喜欢徐渭那样乱来的字，但就是不肯(或不敢)尝试。反观我自己，艺低人胆大，屡屡尝试乱来，但总是乱得一塌糊涂，连自己也目不忍睹。乱写一通而又不令人反胃的书法，其实是要有很特别(不一定是很高)的天分才可以写出来的。”

14.清朝政府对列强的态度

因为在列强说来，虽然清朝政府还没有完全去掉以前那种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思想；但是凭中英战争的经验，列强相信可以用外交或武力把清朝政府屈服，而且由中英战争所产生的南京条约，又可以作为列强进一步夺取各种特权的根据。反过来说，如果让太平天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的话，那是会严重影响到列强的既得利益的。

清朝政府对于列强的态度怎样呢？这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大致分为两派，也就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是顽固派，以咸丰帝和恭亲王奕訢(咸丰帝胞弟)为代表，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属于这一派。另一派是洋务派，以湘淮军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在他们之前，还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大致顽固派对于列强存有疑虑，不信列强会真心帮助自己；洋务派却完全依赖列强，不惜牺牲一切以争取列强的帮助。最初是顽固派掌握大权，到英法联军战后，顽固派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洋务派，大权才转入到洋务派的手里。

说到洋务派和列强的合作，早在1853年4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不久，就已在上海局部实现。当时上海地方官员曾请求英、法、美三国领事武装保护上海，划出一定地区作为租界，交由外国军队负责防卫，并发动外国侨民组织义勇团助战。从此租界主权落入外人之手。到1853年9月，小刀会在上海起义响应太平天国，占领上海城，吉尔杭阿又请求法国领事出兵，帮助清朝军队进攻小刀会；而避开租界的上海道吴健彰更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由三国领事各派一人代表清朝政府向外商征收关税，就这样把上海海关的管理权拱手让给别人。

英、法、美列强屈服清朝政府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求修改条约。关于修约问题，在中英南京条约中本无规定，但在中美通商章程中载有十二年后酌量更改的条文，英法两国援用片面最惠国条款也声明得享有修约权利。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四年)正当南京条约十二年期满，英、法、美三国外代

表就联合向清朝政府要求修约，并提出派公使驻北京、开开通商口岸等十八项条件。

英、法、美三国外交最初在广州、上海两处与地方官员商议修约，以后又乘船到大沽口外和清朝政府代表崇纶(户部侍郎)直接谈判。这时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主要是江苏地方官员如吉尔杭阿等人，力主对列强妥协，接受列强所提条件，同时请求列强出兵帮助对太平天国作战。而以咸丰帝为首的顽固派，则还疑虑列强与太平天国合作，不信列强会真心助战；尤以列强要求派公使驻北京，见皇帝不行跪拜礼，更觉得是损害了“天朝”的威严，因而不愿接受列强所提全部条件，只肯作较小让步，谈判没有结果。

英、法、美列强决心要屈服清朝政府作巨大让步，1854年的修约谈判既然没有结果，他们的第二步行动就是要对中国发动一次新的侵略战争。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月，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率船闯进省河，要求进广州城，被社学民众十余万人示威阻止，并约定永远不再提进城要求；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因此冒功得赏，大得清朝政府信任。1852年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他是一个封建腐朽官僚，对外人态度傲慢，每遇各国外交代表有所交涉，无不严词拒绝；甚至接到外交文书，只略批数字答复，或置之不理，以为这样是“雪大耻，尊国体”。英人受此侮辱，早想乘机报复。

1854年7月，广州附近各地团练中的三合会分子起义响应太平天国，一度围攻广州。叶名琛用残暴手段屠杀起义军和当地武装民众，在1855年内，单是广州城乡被杀的就有十余万人之多，省外各县被杀至一二二十万人。英国侵略者眼看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大受摧残，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就借口亚罗船(Arrow)事件，重提进广州城的要求。

亚罗船事件发生在1856年(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六年)10月8日。有一只专营走私的中国商船名叫亚罗的，从厦门开到广州，被广东水师搜查，并捕去华籍水手十三人。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